

# 《萤火虫之墓》的记忆书写

朱旭<sup>1</sup> 陈聪<sup>2\*</sup>

1.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辽宁沈阳 110136

2. 辽宁大学经济学部亚澳商学院 辽宁沈阳 110136

**摘要:**《萤火虫之墓》是日本作家野坂昭如创作的一部带有半自传性质的短篇小说,小说通过主人公清太的回忆,以倒叙的方式揭示了他在战争年代与妹妹节子相依为命的艰难岁月。作品基于儿童的视角通过其丰富的记忆描写,以小见大展现广大的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无力与悲惨。目前对于这部作品的研究十分丰富与多元,但是在记忆研究领域仍存在亟待丰富的环节,因此,本文采取“集体记忆”理论的视角全方位关照这部作品,解读作品中具有社会性与历史性内涵的记忆书写,以个体与集体双重维度解读日本民众对战争的总体印象与和平观。在理解作品中人道主义价值的同时,其深层结构中蕴含的受害者意识也是不可忽视的。

**关键词:**战争;集体记忆;受害者叙事

## 1. 引言

战争原貌已经难以还原,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文字、图像等尽可能地捕捉历史现实,因此战争文学也是我们把握战争状况的路径之一。日本当代作家野坂昭如基于自己童年的战争体验创作了短篇小说《萤火虫之墓》,故事背景设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日本,讲述了一对兄妹在战争中的悲惨命运。男主角清太的父亲是一名海军现役军官。在战争期间,清太的家乡遭遇了美军的空袭,母亲也因空袭去世,他和妹妹节子在逃难过程中相依为命,投靠了远方的阿姨。清太和妹妹在姨妈家受尽白眼,最终决定离开,搬入郊外的洞穴居住,并且还面临着饥饿和疾病的威胁。为了生存,清太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去偷窃食物,但最终两人也因为饥饿与疾病去世。作为野坂昭如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萤火虫之墓》曾获得第58届直木文学奖,此后又被改编为同名动画电影,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这部小说最引人注目的特质是穿插了许多以儿童为视角的记忆,同时这些记忆并不仅仅是个人的体验而是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因而也符合了日本社会的价值取向。德国记忆理论学者阿莱达·阿斯曼认为“文字既是记忆的媒介又是它的隐喻。”<sup>[1]</sup>而记忆也存在个体性与社会性的两种向度,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率先拓展了记忆研究范围,提出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

需要提取该记忆的连续性。”<sup>[2]</sup>在以清太个体性的回忆之中,构成或者说隐喻了一种社会性的共同体式的集体回忆。就研究现状而言,国内对于小说《萤火虫之墓》的先行研究主要集中在亲情伦理、儿童视角和战争主题等方面,而国外的相关研究关注点在于地域书写、战败现象与战灾孤儿等。显而易见,对于《萤火虫之墓》的研究的理论视角十分丰富与多元,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记忆研究的领域还存在着许多薄弱和亟待丰富的环节。本文以战争记忆对野坂昭如的短篇小说《萤火虫之墓》进行全方位的关照,进而丰富这部作品的记忆研究。

## 2. 个体记忆的承载

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哈布瓦赫认为个体记忆在集体记忆的范畴下才能回忆,而集体记忆需要个人记忆的汇集而实现的,并在个体记忆中映射自己的存在。个体记忆是集体记忆的出发点,当受到外部世界(社会、他人)的刺激时,回忆的平台也同时被搭建完成,从而形成个人与集体双向的回忆机制。《萤火虫之墓》采用了倒叙的叙事手法,穿插了许多回忆性事件,伴随着飞机的轰炸与兄妹二人的见闻,清太的回忆也如影随形。比如在清太背着妹妹逃难时,沿着小路看到了司空见惯的酒窖,“倘是夏日的話,潮水的气息便会四处飘溢,酒窖与酒窖之间五尺宽的空处,会呈露出辉映在夏日阳光下的沙滩和高得出人意外的碧蓝的海”<sup>[3]</sup>;在学校避难时,看到运动器材想起自己在体育课上的运动记录;挨饿无助时自然会想起曾经浪费过的食物,

时常回忆起在沙滩度假的美好生活；可以说作品始终贯穿着对空袭到来前美好生活的追忆，这些描写一方面作为文学修辞，对比凸显了战争与和平两种生存状态，展现出和平的可贵。另一方面，这些过去的个人的回忆与当下的个人的体验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个体记忆，但绝非孤立的、封闭的而又会引起战争受灾者情感上的共鸣。

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强力构建的集体记忆下更能生动地体现个体记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是推行军国主义路线的重要措施，如 1882 年颁布的《军人敕谕》、1890 年的《教育敕语》，而后政府又大力加强军队教育，文化和精神领域也是军国主义宣传的平台。“有鼓吹‘忠君爱国’和战争的，如《爱国进行曲》《爱国之花》《国民进行曲》；有吹捧军队的，如《日本陆军》《海军进行曲》《国民进行曲》……”<sup>[4]</sup>大量的军国主义教育充斥在日本社会之中，甚至连主人公这样的儿童也受到了毒害。作品中多次出现了萤火虫的意象，萤火虫带来的不仅是两个孩童的希望，在看到萤火虫的行列之时，清太联想到了昭和十年（1935）的阅舰仪式，在他在寻找爸爸服役的战舰时，隐隐约约听到了《军舰进行曲》：钢铁城堡浮海上，攻守自如如栋梁。而后在风雨大作的夜里，妹妹节子因饥饿死去，躲在黑暗的坑道里的清太抱着节子的遗骸，“狂风嗷嗷地嗥叫，猛烈地撼摇着枝叶，倾盆骤雨之中，突然错觉袭来，似乎又听到了节子地哭泣声，又仿佛四下里涌起了《军舰进行曲》。”<sup>[5]</sup>虽然都是主人公清太的记忆和体验，显而易见，通过同一歌曲的重复描写作者实现了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所强加的集体记忆的解构。小说开头清太逃难之时，将作为海军的父亲的“第一种正装”——夹克式军装照片贴胸放好。这一细节体现出主人公清太对于父亲的庇护的渴求，深层次上也揭示了清太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心理认同，但是阅兵式的“风光无限”与清太所遭受的“凄风苦雨”形成强烈反差，于是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产生了撕裂。由于军国主义集体记忆的虚假性质，清太的个体记忆不但没有被压制反而被映衬得更加强烈与真实。

### 3. 集体记忆的见证

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为了应对西方冲击背景下的全球互动，以一系列“集体记忆”的塑造来打造现代民族国家。尤其是在侵华战争时期，以“樱花”作为效忠天皇而捐躯的军人形象。在政治力量操作之下，象征军国主义的樱花，通过歌曲、电影、戏剧等传媒向民众传播。

最让日本社会感触深刻的集体记忆莫过于涉及日本本土牵动普通民众安危的空袭。二战结束前夕，美国陆军航空队使用 B-29 轰炸机对日本的各大城市投掷燃烧弹，民众无不处于战战兢兢的恐慌状态中。小说中多处刻画了空袭时的场景，“清太是在工厂的防空壕中眺望那穿过云团飞过大阪湾上空的鱼群般的飞机，而这次它们却在仿佛伸手可及的低空飞行，甚至连机体下部描画着的粗大线条都历历可见。”<sup>[6]</sup>“此时，一颗直径五厘米、长六十厘米的蓝色燃烧弹，哗啦哗啦从屋顶上滚落下来，像尺蠖一样在马路上蹦来跳去散布油脂。”<sup>[7]</sup>这种来自大洋彼岸的战争机器既是作为情节的推动力，又是一种集体记忆的符号。在一颗颗燃烧弹之下，对于民众而言战争由遥远的想象状态转换为当下在场的实感，因而造成了强烈的记忆冲击。

其次，在战争的长期化与空袭的干预下，食品短缺也是日本普通民众所共有的最直观的感受。小说的开头就事无巨细地展示黑市的商品目录：“商品除蒸山芋、芋头粉团子、饭团子、大福团子、炒饭、年糕红豆汤、馒头、乌冬面、天妇罗盖饭、咖喱饭，又增加了蛋糕、大米、麦子、砂糖、天妇罗……”<sup>[8]</sup>二战前，日本稻米并不能实现自给，为了满足国内需求开始进口劣质米。1939 年甚至发布《白米禁止令》：禁止贩卖去除 70% 以上杂质的精米。当主人公投奔远房亲戚，食品短缺生活难以为继时，阿姨提出将清太母亲的遗物拿去换粮食，即使是当初妈妈参观学校时让清太所引以为傲的衣服，但是清太“自己仅仅因为听到‘一斗’这两个字，竟然就有一阵喜悦涌上心头”<sup>[9]</sup>这段残忍而真实的描写也反映出在饥饿的胁迫下，亲情也被抛之脑后。一开始两人带着大量的食物投奔亲戚阿姨家，自然受到了欢迎，当军属特别配给消失之后，阿姨也因为食物短缺将借宿于此的兄妹二人赶出家去。此外，军需景气与物资不足还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39 年 10 月，日本政府公布了《价格等统制令》，规定了约十种商品的公定价格。对于困顿的日本社会，这样的政策显然是于事无补的。当时广为流传的“闇值”这一词汇正是反映了管制外黑市的高价格买卖。“有时鸡肉要一百五十元，大米急速涨价，一升要四十元。”<sup>[10]</sup>物资短缺与物价飞涨迫使清太去别人家的菜园偷取蔬菜、红薯等，甚至在美军的战斗机轰炸时，不管危险到居民街区偷取衣物以换取食物。面对空袭时的无助与恐慌、食品短缺导致的饥饿与混乱，成为二战后期的日本民众的共同记忆。

#### 4. 记忆认同下的受害者叙事

一般来说,受害者叙事是以受害者的视角与立场进行叙事的一种修辞策略。二战后期美国向日本的广岛、长崎两座城市投放了原子弹,众多日本作家就此创作了原爆文学以反映被爆后的惨状。但相当一部分作品只反映日本民族的体验而忽视了日本才是战争的发动者,缺乏总体历史观的角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的战争文学基于其狭隘的立场而缺失加害者的视角,还是一种尚未成熟的文学观。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儿童文学甚至登上小学教材又被翻拍成电影的《萤火虫之墓》一文,是否仍在表达孤立的日本体验呢?在小说中包含着对于作为海军大尉的清太父亲存在的描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日本的加害者叙事,但妹妹节子询问哥哥家被烧毁了怎么办时,清太回答说到爸爸会给我们报仇的。又比如清太听到父亲所服役的巡洋舰覆灭的消息时,感受到“真实感”远超妈妈之死。因为军队里的父亲是清太的希望,这种希望不仅是亲情伦理层面上的,而且还隐喻着对于战争胜利的期望。显而易见,作品中唯一与战场存在联系的爸爸这一角色,也被赋予了所谓“报仇”的内涵。在这部小说的最后,清太每次都要趁防空警报响起之时跑入村子偷窃,“清太每次外出时,必定要从人家的菜园里偷来只有小拇指大小的黄瓜、青番茄给节子吃。”<sup>[11]</sup>甚至还会明目张胆地抢劫,本以为从一个小朋友手里抢来了苹果,结果是生红薯。即使是被农人抓住了现行,也被优哉游哉的警察释放。而清太的核心逻辑在于为饥饿的妹妹抢夺食物,这段十分具有象征意味的情节不难想到二战时的日本的行径。在战争中迷失方向、价值观错乱的清太,可以被认为是当时日本民众状态的生动写照。在这一可以被归属于儿童文学的作品却蕴含着法西斯主义的色彩。总的来说,《萤火虫之墓》在表达对于创伤经历的记忆时,没有直接面对原生态伤痛本身,反而专注于混淆事实和感受的创伤,因而归属于狭隘的、不健全的受害者叙事。集体记忆在建构的过程中,并不是完全地再现历史真实,必然会包含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正如同在大多日本战后文学作品中其实是高扬了受害意识,而这种意识反而迎合了群体的情感追求。

#### 5. 结语

作为在日本广为流传的作品,《萤火虫之墓》通过一系列战争体验来塑造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必然会引起群体的认同,从而获得凝聚力。“集体记忆对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

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彰显出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两个方面的有机融合。”<sup>[12]</sup>在空袭、逃难、饥饿叙事下,小说将侵略行径掩盖甚至美化为走投无路的偷窃或抢劫行为,日本民众的战争受害意识被放大,从而达到集体认同的效果。也正是因为如此,不健全的集体认同演变成为广泛的受害者叙事。作为儿童文学且曾登上日本教材的《萤火虫之墓》,其表现的儿童的悲惨遭遇至今仍让我们为之动容,深感和平的可贵与幸福的来之不易,但是在作品的记忆书写中仍包含着日本民众对于受害者叙事的群体认同,缺少追本溯源的清醒认识与刀刃向内的勇气。

#### 参考文献:

- [1]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与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06.
- [2]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65.
- [3] 野坂昭如.萤火虫之墓[M].施小炜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9.
- [4] 蒋立峰,汤重南.日本军国主义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519.
- [5] 野坂昭如.萤火虫之墓[M].施小炜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35.
- [6] 野坂昭如.萤火虫之墓[M].施小炜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8.
- [7] 野坂昭如.萤火虫之墓[M].施小炜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8.
- [8] 野坂昭如.萤火虫之墓[M].施小炜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4.
- [9] 野坂昭如.萤火虫之墓[M].施小炜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24.
- [10] 野坂昭如.萤火虫之墓[M].施小炜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35.
- [11] 野坂昭如.萤火虫之墓[M].施小炜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30.
- [12] 艾娟,汪新建.集体记忆:研究群体认同的新路径[J].新疆社会科学,2011,(02):124.

#### 作者简介:

陈聪(1981—),男,辽宁兴城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部亚澳商学院教师、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西方比较文学。